

托夫勒思想随想

■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刚才姜奇平和梁总都谈到了一些引申的东西,刚才我跟梁总也讨论了。我看了一下我们这次在座的只有三个“70后”,即70岁以后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理性一点,感性还要加理性。确实托夫勒在80年代初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学界的人士一些思考,有一些新的路子。我们三位“70后”都是在工业总产值的那个时代过来的,我们只懂得工业和农业,只知道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托夫勒给了我们一个信息社会的图景。80年代初,那时候刚刚从邮电部调到研究院,组织我们看影片,感觉到他们也是思想很超前,而且很对路。当时我们也是怀着一种振兴中国的梦,托夫勒讲的东西跟我们很对路,感觉为之一振。后来又接触了两个人,对我影响不亚于托夫勒一个是丹尼威尔(音)——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托夫勒是一个启蒙的记者出身的未来学家,丹尼威尔更像一个做学问的人,深入研究一些更深的结论性的东西。他专门有一个文章,说这个世界产业将走向服务业,将来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了。还有一个人是当时在科技会堂见过,当时我也提了几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托夫勒更超前一点,更浪漫一点,后面两个人是更朴实一点。不管怎么样,事先想到了第三次浪潮这个事就是很了不起。

第二次,刚才听了姜奇平的介绍以后,我也

第三次浪潮与信息革命

■ 郭昕

托夫勒确实是像梁老师和杨老师这两位老师讲的一样,对我们的一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没有见过他,很遗憾,各位老师都见过他,但是我没有见过。第一次听说他的时候,大家都说北京街头最流行的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那时候刚刚在学校里当老师,觉得这个好,拿来给学生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前几天在上海说,中国很缺未来学家,中国不缺历史学家。我觉得是一种思想方法,如何往前看,用前瞻的思想去指导、建设我们的现在,或者是把未来的规划做得更好,得有一个思想方法,怎么去把握这个未来的趋势,怎么去把握未来。后来工作了之后,有幸接触到了另一位美国的未来学家,写大趋势的,我们报告出了以后,他写了一本亚洲大趋势,专门召集一大帮的人开会,让他看到我们发的全球的报告;后来写亚洲大趋势的时候,专门跟我们座谈,在第二本书当中,大

托夫勒对中国的影响

■ 刘九如

刚才大家说得非常感性,我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有一些片断在脑海里显现出来,所以想说两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我们的年龄是80年代的那个年龄——记忆太强烈了。我印象里面,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就是读的书留下印象。刚才春晓说是信徒,我还没有到研究层面,不敢说是信徒,确实是这本书对我个人的影响比较大。曾经在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工作,当时创办IT经理世界杂志的时候,总是从未来发展和信息化浪潮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观点和思想都是来自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我们经历了30年代改革开放的路程,我觉得在潜意识里面确实是改革的深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2008年离开计算机世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到一个课题组去做江泽民同志《论信息技术发展》那本书。我是跟着工信部一个副部长的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到了未来学和托夫勒的一些思想,反复地讲。我就见过他一次,也是在扬州和苗部长一块儿,听到他多次谈到托夫勒的这本书。江泽民正好是80年代在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对未来的冲击

■ 舒华英

这些重大的事件基本上都是经历过的,这里面托夫勒当时讲的第三次浪潮,是在80年左右出的书。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所以很快的这本书就翻译成中文了——中信出版社翻译的——我那天无意中整理旧书的时候翻出来了。这本书是7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书的基础之上又深化了,当时那本书叫《未来的冲击》,记录了当时美国的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刚才大家讲的都挺好,1980年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有一个前提,前提是1978年开始全国改革开放,而且全国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就是说科技的春天来到了中国。将来我觉得我们50人论坛是不是可以把钟校长请来,他的很多观点是非常超前的。他现在忙着人工智能,在那次会议上是筹备组和起草组的。他回来以后传达的精神就讲到了信息基础设施,信息通信。在这个时候,在1978年的时候,这次会议完了以后,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第三次浪潮,由于上面有这种很开放的态度,所以才有可能在学界、业界引起更大的反响。

到了国内以后,1987年的时候,当时邮电部科技司列了一个题,给国家做了一个信

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社会的架构的一个课题。我1986年从国外回来,1987年参加了这个课题。这个课题虽然是邮电部的课题,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的最基础的问题是信息通讯的问题。到了90年代,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博士生做的博士论文,是对一个城市信息化程度的评价,当时对美国的几十个产业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了分类,而在这个分类当中,他认为应该把其中有些产业剥离出来算作信息产业。我们现在也在每年发布信息化的指数,后来才出现了评价指标。

我觉得对托夫勒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刚才奇平讲了为什么用浪潮这个词,其实浪潮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无论是意识形态也好,社会思想文化也好,我们有一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在不停地往前推进,一个浪潮过去以后,一个浪潮又来了,但是第一个浪潮和第二个浪潮中间都有继承。把一个历史发展隔断,来一个所谓的颠覆式的或者说是什么的,我觉得托夫勒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认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应该前后继承,而且推陈出新,所以他认为未来已来。

部门吗?有一次我们一起从郊区回来,坐在一个车里,当时说我们现在搞国家整体经济,你那个信息经济是很小的一部分,就纳入到总体经济中走就行了,我说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说我没有想到。

我们还是坚定不移地向前看,同时怎么样更理性更能够用否定之否定或者是扬弃的办法来做这个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讲的第三次浪潮也好,还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也好,会不会被别人给抢了扬弃?托夫勒最后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跟他夫人一块儿来的,托夫勒讲了说有可能第三次浪潮过后第四次浪潮来了,信息时代到生物时代。而现在看来不一定是生物时代,可能是智能时代,有可能智能社会代替信息社会。有人提了知识技术,我是很反对的,讲了半天还是计算机,集成电路,光纤这些东西,将来智能技术来了之后,会不会是机器人啊,芯片啊什么的。但是托夫勒的夫人跟托夫勒的观点不一样,托夫勒夫人说不管是生物芯片还是智能芯片,还是信息技术,她不承认第四次浪潮。这个还需要探讨,苏教授也说过,世界不是三维的,也不是四维的,可能是十一维的。信息时代将来怎么样,也是有我们自我的成分,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趋势,这是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也是把信息技术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人类的社会未来不会高于信息社会,再进入另外一个社会,很难说。但是实际上信息本身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从大生产,从机械动力开始,信息取代了机械的动力,取代了大生产,取代了很多管理的生产方式,变成最重要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我们在外面讲的话很多人听不懂,或者说你讲的不对,但是回到这里我们总觉得讲的高度不够。我写感言的时候说我们个人都是一滴水,都是一个U盘,这个U盘必须放在大海里才可以。但是托夫勒的这些未来的思想方法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一个是往前看,第二个是要把所谓的虚拟的、精神的、信息的东西和实体的东西进行扬弃结合,这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一点。

个启蒙。还有一个契合,契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3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和这个有一点契合。我个人感觉是印象比较深刻,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值得总结。

谈到总结,我有一个想法。在托夫勒的未来学里面比较清晰地提到了信息社会的分享或者是预测,但是到今天,中国对信息社会的研究,除了我们50人论坛比较鲜明地提出了信息社会的这个字眼以外,中国总是扭扭捏捏,没有把信息社会拿出来研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欧盟国家有一些东西已经成型了,包括信息经济的研究都不够系统化,这一点我要提醒各位专家,正好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

这30年正好跟托夫勒的一些预测契合了,但是30年发展,有一些东西也没有研究。习总书记有一句话,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个提法有一些思想背景,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更多的文章来证明和验证习总书记说的话是怎么来的,什么样的背景和走向。我们思考或者是回顾托夫勒的一些思想,以及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做一些总结和研究,这样也会更有意义。

至于说现在存在的,已经存在的这些事物,包括技术各个方面,都有可能进入到未来。但是谁能进入到未来,这个还要看未来的条件。我觉得这是他的最关键的。有了这个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在哪儿?就是存在的各种业态,各种变化,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他已经存在了。刚才说到对信息社会的这个词是否承认,我个人看,你中央文件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个人认为已经无关紧要了。回顾到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么重大的变革,我们国家还很穷的时候,这些曙光已经出现了。到了今天,从生产力的角度,从社会变革的角度,人们的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来看,不叫它信息社会也没有关系,随便叫,但是人们的形态和思想已经是一个浪潮一样,不停的在一波一波地往前走。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我们这儿的50人论坛,顺便说一句,这些名词概念可以去不同的场合发声,但是重点不要放在这个上面。就像我们已经做的事情一样,更深入地总结一下我们已经过来的这些规律性在哪儿,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对未来做一个不要说很长时间的预测和研判,也可以做一些短期的研判。

托夫勒浪潮的心路历程

■ 王俊秀

我要先讲一下几次浪潮的事。从托夫勒开始,到现在,大致经过了三次或者是四次小浪潮,大浪潮之后有几拨国外的思潮或者是未来学这一块有几拨。一拨是托夫勒、贝尔为主,当时我们还是在上学的时候,到1992、1993年之前。

第二拨,当时在计算机世界有一篇文章,叫《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这是第二拨。以尼葛洛庞帝为主,直接影响到了互联网产业。到互联网产业之后还有几个人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比如说的2.0的那个人,包括硅谷一直做分析的那个人,包括大数据的,但是还是停留在行业,这个不算第三拨,也可以算第三拨。还有一拨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最近三年比如说对中国来说,彭特兰算一个,还有弗洛里迪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和复杂系统、进化理论那些东西是相关的。在那个时候,互联网发展到那个庞大的现象的时候,和生物的观点正好契合了,好多人都看了,我觉得可能是和这个有关系。

比如说彭特兰的智慧社会,至少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主要的启蒙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通过他们学到的。我之前学的都是法律,这些东西早就忘光了,当时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法律可学,那时候就是几部法律,后来基本上就不学法律了。李鹏同志上台以后,到了全国人大以后颁布了好多的法律,后来我们都没有机会搞这些法律了。90年代以后,零零星星地通过这些形成了一个知识结构,大致是通过这些人形成的。

我刚才拍了一个照片,说是托夫勒之光。后来我第二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在书架上看到了一个贝尔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其中有一段讲到了权力将来会转移到信息部门,当时脑子里不太清楚信息部门是什么,但是有一个特别具像的职业种类,就是打字员,打字员就是信息部门。因为当时我毕业以后有一段时间分配到了山西的一个机关里面,机关里面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有一拨人是临时工,这个临时工大部分都是负责处理信息的,比如说打字员都是临时工,但是这些打字员的权力很大,因为这些正式干部基本上都不会打字,不会处理这些信息,都是这些打字员掌握着这些信息。那个时候不是说每个单位都配备打字员,一个县委是整个的楼里有一个打字室所有的文件都交到那儿,所以打字员愿意先给哪个部门打字,这是一项权利,所以你要给他好处,才会给你排到前面。

第二个就是通讯员,通讯员也是临时工,但是通讯员给你送文件也很有说道的。他给你不给你送,或者是什么时候送,现在想起来也

托夫勒浪潮的思想情结

■ 张新红

尽管托夫勒去世了,大家心里面都是热乎乎的,都想聊一聊。我相信对信息社会有情结的人,对托夫勒这个名字都是记忆深刻。我个人就是,托夫勒思想在我的个人人生中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第一,我能够一晚上把这本书读完。为什么要一晚上读完呢?因为第二天就有人等着看,而且做了满满一本日记的人。第二个是这本书我买了三次,现在我再去找的时候,一本也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我一说,都借给别人了。第三个就是这样一本书,就能够让我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那时候大学刚刚毕业,我们班联系工作都是我联系的。当时在北京找工作很容易,我就挑了国家信息中心,人家说为什么选这个单位?我说这是朝阳。待得不顺心的时候就想信息社会肯定会来的,结果闹成了这一辈子没有换单位和职业的人。有的时候想起

链接

“信息社会”花絮

姜奇平:有一个老局长说服了中央领导不用信息社会这个词,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加入信息社会,应该是中央党校管这个事,这个事就卡住了。实际上现在中央党校没有承认信息社会。

杨培芳:1986年的时候,人民日报专门发文章批判信息社会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只能有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出现信息社会。后来钱学森都出面讲了,这个不矛盾啊,但是他说了以后也没有被认可,现在还是不承认。

张新红: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主要的文件中确实是不曾出现过信息社会这样的词。但在什么时候出现过呢?一次是在咱们参加信息社会高峰论坛的时候,因为咱们要参加国际会议,所以副总理出席的时候,主题就是谈信息社会,那个时候出现过一次。后来在2006年发布的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时候,2006—2020年的战略里面,两个地方提到了信息社会。一个地方提到了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社会。第二个是讲这个战略到

是一种权利。当时的感触特别深,直接影响到我个人的就是我来了北京,突然发现什么都不会干,我夫人也什么都不干,刚来的时候干什么啊?有一个同学说,你赶紧让你夫人学学电脑。当时中国的录入电脑这个事是非常大的事,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但是当时还要背口诀,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背口诀一样,其中有一句非常有诗意,叫什么什么无尾鱼,就像武侠小说里面一样,很有诗意。我背了半天觉得真的背不了。我夫人背会了背会了以后就直接工作去了。我就直接去中关村发展,就成了IT专家、互联网专家之类的。

实质上是这样的,为什么能够存活下来呢?我现在回忆,中国的IT产业,以九如为首的他们是兵强马壮,背靠IDG,当时都是非常庞大的。他们的启蒙其实是行业启蒙,他们是精英,我们是另外一拨人,就想提倡一种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行业知识让社会听懂。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巨大的转换空间,就听这些人讲,搞技术的这些人讲,讲PC里面的概念,软件里面的概念,大致讲着讲着听懂了,你再用你自己的语言写出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中国的IT启蒙大致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数字论坛的人都是不伦不类的,包括刚才谈到的,都是打官司,大年三十被人从家里弄出来了,没有办法来北京打官司了,都是这样的,都是很边缘的这些人,伴随着这个产业起来了。时不时地还得证明一下自己,弄一个什么单位给我挂靠一下,是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起来了,然后不断地有了这种理论。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亚于美国当时硅谷的那拨人。硅谷当时做杂志的是杜兰德,包括KK,其实KK也不上互联网,他电脑也玩得不溜,跟马云一样,都是类似这样的一拨人做起来的。他有一个巨大的文化背景,我觉得中国其实也是在另外一个变革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托夫勒。当时这本书的引进还是非常有故事的,所以三年能够做起来,这本书能够做起来,是很值得挖掘的一件事。

当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受到了震撼,第一次看到了以后觉得这个世界是比较新的,看到了四通公司和联想公司自己印的那种刊物——那种刊物对你的震撼和冲击比恋爱的大片大多了。中国还有这么一批人,照片也不知道怎么照的,非常高大,是仰拍的还是怎么着,一拨人在一个台阶上,都是很年轻的,穿着蓝色的制服,觉得非常好。当时的四通和联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中关村的情结非常浓。

托夫勒,我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托夫勒太伟大了,对我的影响居然这么大。第二句话是如果不是托夫勒,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今天大家谈托夫勒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世界,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觉得奇平说得对,托夫勒之光,不仅照亮了人类的未来,还照亮了我们50人论坛。

第三次浪潮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支撑着我们走到现在,我连变都没变。九如还有舒老师提出了三次浪潮契合了时代的诉求,也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另外托夫勒分析的方法,那些独特的眼光,那些独特的智慧,我觉得这个影响不会随着托夫勒走了就会失去了。包括现在我们50人论坛自身的发展的很多思想,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20年的目标就是要为进入信息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还不是信息社会,但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要为进入信息社会奠定基础。这次在起草新的战略纲要的时候,前期我带着我的团队也参与了,我费了很大的努力,基本上在起草组里面形成的一致意见,用整个信息社会发展的大思路重新构建发展战略纲要框架。所以里面也写了信息社会。但是后来在讨论的时候又被拿掉了。据我理解,托夫勒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或者是还有很多人至今没有被托夫勒所影响。让我感觉到十分不理解的是,研究信息化的这一圈老专家里面,竟然对信息社会这个词不感冒。但是这一次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呼之欲出的信息社会,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说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什么意思?呼之欲出,已经基本上把我们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信息社会这个词鉴于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没有写进去,但是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三次革命写入中央的高级文件是第一次,我觉得很好。